

「二羅」的書

● 鄧雲鄉

柳存仁教授自遙遠的堪培拉來信，問我傅斯年寫給胡適的信中所說的「二羅」是不是指羅常培和羅庸？我回信說「是的」。傅信收在《胡適來往書信選》下卷，寫信的時間是1945年10月17日，正是抗日戰爭剛剛勝利後不久，當時胡仍在美國，而傅則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。「二羅」中的羅常培當時也在美國，羅庸則在昆明，兩位都是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。但其關係是屬於「北京大學」的，復員回到北平後仍要回北大工作。現在的讀者對這兩位羅先生所知不多，但在當時，他們都是「七七」戰前北京大學的名教授，後來抗戰軍興，就隨學校內遷，輾轉到了昆明。北大、清華、南開合組西南聯合大學，兩位羅先生在中文系中也是名教授。傅信中談到北大復校的人事設想，說到「國文系」，一開始就說：

國文系：二羅皆愈來愈糟。孫子書、孫蜀丞、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節（三人似可擇聘），語言學亦可有很好的人。此系絕對有辦法，但主任無人。

傅對「二羅」有意見，而羅常培對傅及羅庸也有意見。在1946年4月24日羅常培致胡適的信中說：

國文系……文學組始終沒上路子。膺中關於文學史方面指導了幾個學生，但我總覺得他對整個文學的觀點總有些隔膜，而且篤信密宗，縱妻行同巫覡頗為一班同人所指摘……即以膺中而論，我可謂大義滅親。（雖然我和他沒有親，並不如頡剛所推測。）

由此可見「二羅」之關係。又從羅信中稱「連素以義和團學者見稱的傅胖子」及「孟真近來對我不大好」等語，亦可想見其與傅的關係。

存仁教授來信問的就是這段話中的「二羅」，可是我對這兩位老師也是只聞其名而未識其人。最近分別讀到兩位的書，一是羅庸先生的《鳴池十講》，收在「新世紀萬有文庫」中；另一本是羅常培的《蒼洱之間》，收在「書趣文叢」第三集。

羅常培先生，字華田，號恬庵，北京人，滿族，姓薩克達氏。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，長期在北大任教，是語言學專家。40年代中期，曾去美國講學進修，我在1947年畢業時，先生尚未回國。《蒼洱之間》是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時寫的遊記，「蒼」是點蒼山、「洱」是洱海。此書也是我讀到的先生的第一本書。先生另有十餘種語言學專著，一般是讀不懂的，所以

我一本也未讀過。但我卻十分愛讀先生這本不厚的書。

《蒼洱之間》包括〈蜀道難〉、〈蒼洱之間〉兩部分。前者記作者由昆明到重慶、瀘州、樂山、峨眉、成都等地訪問旅行的過程，附有冰心的序和自序。冰心在序中說：

這篇遊記裏，便充分的表現了羅先生的人格：三個多月困難的旅途，拖泥帶水，戴月披風，逢山開路，過水搭橋，還惶惶的逃了好幾次警報，歷盡了抗戰期中旅行的苦楚。可是他的豪興一點不減，他研究了學術，賞玩了風景，採訪了民俗，慰問了朋友……讀之不厭其長，惟恐其盡！

從冰心的序中，可見這篇遊記內容的豐富。半世紀後讀此書，所記載的就不只是遊記而已，而是一篇生動的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化教育界的歷史實錄了。從5月下旬離開昆明，到8月下旬回到昆明，一路上坐了飛機、汽車、黃包車、輪船、木船……，現在讀者是無法想像當時這些交通工具的簡陋與破爛了。

當時全民抗戰，除去軍政經濟各界會聚了全國精英以外，在文化教育界，也都聚集了30年代南北各地，包括北平、天津兩地的著名學者。與羅先生同行的還有清華校長梅貽琦（月涵）、教授鄭天挺（毅生）。他們此行目的是到重慶向教育部報告西南聯大校務；到川南敘永視察聯大分校；到瀘州李莊參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、社科所；到樂山、峨眉、成都等地參觀武漢、四川、華西、齊魯、金陵各大學。所以一行除了旅途艱苦、躲敵機、跑警報、遊山玩水、逛峨眉、吃成都川菜小吃以外，還見到不少文化名人，記錄了當時不少文化教育活

動，這些都是珍貴而生動的史料。如記西南聯大敘永分校，由楊今甫、褚士荃領導視察，楊是這裏的負責人，即作過山東大學教務長的楊振聲。瀘州是著名酒鄉，現知者甚多，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就在瀘州板栗坳李莊，負責人是考古、甲骨文專家董彥堂（作賓），他後來去了台灣，是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領導人。記中寫道：

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學生留在李莊的有任繼愈、馬學良、劉念和、李孝定四個人……李君受董彥堂先生指導……任君研究的題目是理學探源……

李孝定教授現在是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，任繼愈教授則是北京國立圖書館館長，他們源出一脈，都為華夏學術貢獻終生。當時營造學社也在這裏，建築專家梁思成、林徽音教授都在這裏，文中記林因患氣管炎，「正在院子裏躺在帆布牀上曬太陽」。50年代後期，林也是因此病去世的。

此外，羅常培亦曾到朱山武漢大學看王撫五（王星拱），當時王的頭髮全白了。好說「閒話」的陳西滢則鬢雜白髮、背微拱起，較之東吉祥胡同時代老多了。另外還見到楊仁樞、朱東潤、蘇雪林……80年代初我去復旦，還幾次同朱老見面。蘇在台南，已是百歲老人，去年還有消息，近則不知如何了。抗戰時期的成都，是著名教會大學的集中地，北平燕大、山東齊魯、南京金陵，都集中在華西壩華西大學，名教授也會聚於此。朱自清（佩弦）、錢穆（賓四）、呂叔湘、吳貽芳、顧頡剛、蒙文通、馮友蘭（芝生）……數不清的學術大師，在羅文中都一一

記到，或是學術研討之際，或是觥籌歡暢之時，不一一贅引了。其中特別記到「北大文科研究所近兩年來所收的劉念和、王叔岷、王利器諸生」，他們都是川大文學院院長向先喬（楚）先生指導出來的。王叔岷先生現在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；王利器先生在北京社科院。這兩位北大前輩學人與我均有友誼，只是當時的「諸生」，現在都是精神矍鑠的八秩五六的老人了。羅先生由成都回到重慶，又見到沈士遠、許季弗、蕭鍾美、汪旭初等人，說「鍾美是二十年的老同學」，這「鍾美」就是去年初在北京去世的百歲老人蕭重梅（勞）仁丈，歲月悠悠，前輩儀型均隨世紀而去了。

對現在的學術文化界來說，羅庸先生的名字似乎很陌生。羅庸字膺中，原籍揚州，北京長大，幼年讀私塾，其父希望他成為一名中醫，以《王叔和脈訣》啟蒙。民國二年（1913），十四歲進史家胡同中學，在私塾已熟讀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詩經》等書。十八歲四年中學畢業入北大文科國文門，已是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。後在北京工作，與魯迅先生有來往。《魯迅日記》之十二中11月8日記云：「陳援庵贈《元西域人華化考稿本》一部二冊，由羅膺中攜來」；《日記》之十三中5月21日記云：「晚以女師校風潮學生東邀調解，與羅膺中、潘企莘同往……」30年代初期，羅也是八道灣苦雨齋的常客，雖無廢名、平伯諸先生之三天兩頭來，而次數也不少。如新刊《周作人日記》下冊1932年8、9月間，就三次記到膺中。8月21日記：「膺中來，贈筆四支。」29日記：「訪川島，又四訪膺中不值。」9月17日又記：「川島、膺中來訪，六時去。」均可見其與知堂之關係。羅庸在北大畢業晚羅常培四五年，他沒有出國留學過，只在二十八

歲時代表一學會到日本帝大開會，去過東京、京都、名古屋等處，親見日本人對於侵略中國之處心積慮。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北伐成功後，他曾到南京支那內學院拜歐陽竟無。同年末到廣州，即任教中山大學講《莊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論語》等。其時魯迅早在一年多前，即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10月已到了上海。新版《鴨池十講》前記中介紹說：「1928年秋，應魯迅之邀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」這顯然是亂說。羅於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又回北大任教授，教文學史與詩詞方面的課。前引知堂日記，也正是這個時期的事。從日記中可見，他與章川島關係較近。抗日戰爭時，他隨學校內遷，先到長沙，後經香港去昆明，任西南聯大教授，一度曾代理系主任。勝利復員後，羅留在昆明並主持昆明師範學院，直至1950年去世。

1943年，《鴨池十講》由昆明開明書店出版，這「十講」是羅在西南聯大的十次講演稿。為甚麼叫「鴨池」呢？這是因為昆明的滇池在元代本名「鴨池」，羅氏室中懸掛昆明玉案山筑竹寺元代白話聖旨碑文，就稱昆明為「鴨池城子」。羅氏因記古地名之故，以名其書。

這十講是〈我與《論語》〉、〈儒家的根本精神〉、〈論為己之學〉、〈感與思〉、〈國文教學與人格陶冶〉、〈詩人〉、〈思無邪〉、〈詩的境界〉、〈少陵詩論〉、〈欣遇〉。據作者「前記」說：「〈論為己之學〉是為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南聯大支團部的刊物《聯大青年》寫的……」自是當時重慶政府官方思想宣傳，現在也能公開重版，真慶幸改革開放時代的偉大了。在這十講中，所論多是儒家學說、立身處世之道，現在讀起來感到有些迂。羅氏在〈我與《論語》〉一文中說：

我根本不懂哲學，儒學呢？至今也還沒有懂。本不配來說話，但儒書畢竟讀過一些，因此定了這個題目，想把自己讀《論語》的經過，向各位報告一下，或者比較切實些。

這話說的雖然有些謙虛，但基本上還道出一個中國舊式讀書人的本分，即重在身體力行。不過某些論調讓人覺得他是個迂夫子，如在〈詩人〉一文中，他就考證「詩人」在《楚辭·九辯》中的出典，說這是很尊貴的名詞，不可亂叫。說道：

近二十年來，新詩發生……詩人一名，才又在新文壇上出現。於是，凡有一兩本詩集出版者，大家便群以詩人呼之……我不知道在外國是否應當如此，若在中國，詩人一名，是不應該如此濫用的……。

在今天看來，這樣的論調真的有些多餘了。

「二羅」的書，羅常培先生是記事之作，所記都是抗戰時文教界人士在四川一帶的情況，現在讀者知之甚少，讀來頗有情趣。羅庸先生講為學、講儒家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翻天覆地、九死一生的急烈變化，今天重讀難免昏昏然，有些感到可笑。不知現在國際上一些新儒家學者讀來又如何？

再有前引羅常培先生致胡適信中所說「篤信密宗」及「縱妻行同巫覡」等辭語看，詳細情況雖然不能了解，但從《鴨池十講》格格不入時的思想，也可想見其當時所談跟現實的距離有多麼大，因之對其北大復員時不能再回北京，或不願再回北京，或不能再回北京之北大，種種人事複雜情況均可想見。加以當時時局，或自以為繼續

留在昆明，免再度奔波之苦，亦可以理解了。

關於西南聯大敘永分校的情況，有必要補充幾句。據北京王景山教授函告，1940年7月日寇佔領安南（越南），雲南成為前線。重慶國民政府及教育部欲將聯大遷往四川，幾經討論並實地調查，聯大常委會於11月13日決議成立敘永分校，該年度大一新生即在敘永報到上課。但因抗戰時期交通困難，遲至1941年1月才正式開學。5月，聯大校務會又決定取消敘永分校，集中在昆明上課。到同年8月底，敘永分校完全結束。梅、鄭、羅三人去敘永即為此事。楊今甫先生當時以西南聯大校秘書主任到敘永分校任分校主任，到8月辭職回昆明。褚士荃，上海金山人，原清華機械工程系教授，時為敘永分校訓導主任。鄭毅生先生時為聯大歷史系教授，又兼聯大總務長。

敘永分校新生說是上了兩學期課，實際卻不到半年，其教師陣容強大。如教大一國文的是楊振聲、李廣田、吳曉鈴等位，教大一英文的是陳嘉、王還、楊國翰、王佐良、查良鏗（穆旦）等，教中國通史的是吳晗，教邏輯學的是張蔭麟，教普通物理的是鄭華熾、霍秉權，普通化學是孫承諤、劉雲浦，普通地質學是袁復禮，生物學是李繼侗，指導化學實驗是唐敖慶，後均成為著名學者，可以想見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人才之盛了。景山教授遠道寄來如此珍貴資料，引用如上，謹致謝忱。

鄧雲鄉 文史學者，現居上海。著有《燕京鄉土記》、《文化古城舊事》等書。